

# 全国功能语言学历届研讨会 (1989—2003)的见证

■ 胡壮麟

[摘要] 2003年在秦皇岛燕山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功能语言学会的理事会上,我再次提出由于自己的年龄偏大、任务繁杂、精力不济,望退居二线;同时,考虑到我国功能语言学的长远发展和走向世界,我提议中山大学黄国文教授接任会长。承蒙各位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全体代表的谅解和照顾,接受了我的意见。人总是有感情的,在一下一上之际,难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有的模糊,有的清晰。乘记忆尚未完全褪色以前,写上几句,留作纪念。

### 一 1989

功能语言学的第一次会议是1989年8月3日至5日以“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的名称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我本人1981年5月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进修回国后,历年都有中青年学者学成回国。有关论文和专著也多起来了,这为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但最初提出召开研讨会的是原华南师范大学的徐盛桓教授,这是他来我家访问在饭桌上提出的。在此之前,我已看过他不少论文,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他比我更投入,因此我表示该由他牵头,我协助。

后来,徐盛桓教授可能患病,也可能没有得到所在学校领导的支持,这个会没有搞起来。我的情况则有所改善,当了系主任和教授,通过创收,经费有了着落,也有了一批研究生张罗会务。在清华大学方琰教授、苏州大学朱永生教授、聊城师范学院张德禄老师等的鼓励下,紧锣密鼓地办了几件事。先是打报告,取得北大校领导同意;然后,经校外事处的批准,邀请我的老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夫

妇前来与会。会议原计划在7月召开。正如我在拙著《认知隐喻学》中所说的那样，我的一生总是与突然事件相联系，1989年国内发生了“六·四”事件。我是在一片混乱中进城办签证和买飞机票的。6月9日坐上芬兰航空公司最后一个航班去赫尔辛基大学参加第十六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韩礼德见到我后，说他的夫人哈桑很想来中国，但又怕中国太乱，不能来了。我对此除了表示理解外，别无选择。回北京后，会议如期举行肯定不行了，但我和同事们、朋友们一直在分析形势，会议最后还是延到8月举行了，这说明我们对国内局势稳定充满信心。我记得在开幕式上我发言时曾说了一句“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研究功能语言学的决心没有动摇”，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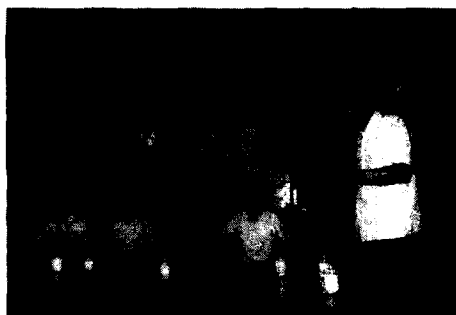
第一届全国功能语言学年会  
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

最令人终身难忘的是这么一次规模不大的会议受到了学术界的前辈和北京大学领导的重视，参加开幕式的有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季羨林先生、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许国璋先生、中国外语教



季羨林先生、许国璋先生、李赋宁先生和王义遒先生亲临第一届大会指导

学研究会副会长李赋宁先生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给大会致开幕词的是我的老师李赋宁先生，其余老先生也分别致辞，表示勉励。如今有两位老先生已经谢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永怀在心。



北京大学李赋宁先生代表英语系致欢迎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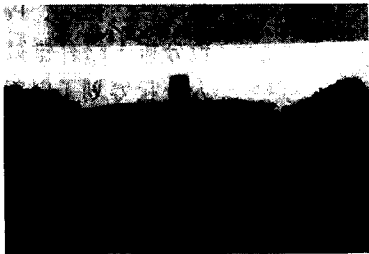
这次“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有25所院校，共36人参加。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与会的有方琰、朱永生、张德禄、杨潮光、周光亚、赵建成、张锦芯、徐亚琴等；有在英美留学的黄震华、祝畹瑾、姜望琪等教授；也有国内著名教授乐眉云、方家树、卢兴举、潘幼博等。徐盛桓和王寅教授虽未与会，也向大会递交了论文。我的老友，搞数理语言学和界面语法的方立教授没有门户之见，也参加了会议，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每篇论文都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大家聚在静谧的未名湖旁的临湖轩西侧厅中，没有职称、年龄、地区、单位的屏障。人们追求的是知识和友谊。我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语言系统与功能》（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说：“这次研讨会总结了我国系统功能语法在80年代的进展，检阅了正在形成的分布于全国各地，包括各个年龄段的研究者队伍。”

## 二、1991

第二次会议于1991年暑假在苏州大学召开。在我印象里，这是一次与自然灾害搏斗的会议。那个时候，南方发大水，我从北京搭火车去苏州，出了徐州，铁路两旁洪水肆虐，一片凄凉。到了苏州大学，本来是绿树成荫的校园，被东倒西歪的沙袋和破砖乱瓦折腾得满目疮痍。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主任韩礼德教授和他的夫人 **Ruqaiya Hasan** 教授亲临会议指导。其它外国学者有澳大利亚 Marquarie 大学的 **Christian Matthessen**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 **Michael Cummings** 我在北大指导的澳大利亚留学生 **Edward MacDonald**（马爱德）会议的论文集《语言·语篇·语境》由朱永生教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朱在前言中



第二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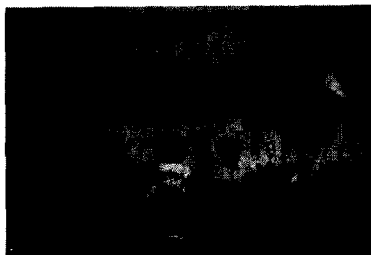
指出：会议的论文已经从客观介绍发展到全面评价，从机械模仿发展到灵活应用。

这时，第18届国际功能语言学年会即将在日本东京召开，我委托韩礼德和 **Michael Cummings** 在会上提交由北京大学举办年会的申请。按程序，国际功能语言学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美洲、欧洲、亚洲和亚洲举行。这次申请很顺利，并被安排在四年之后的1995年。由于在日本举行，我写了“有关日语主位的若干问题”（后发表在《外国语》1992年1期，1-7页）一文，也托 **Michael Cummings** 带到日本，由大会处理，后来听说杨潮光教授正在日本访学并参加了大会，大会让他代为宣读了。据说，在会议上还轰动了一阵子，韩礼德敦促日本学者应像中国学者一样，将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日语研究。

## 三、1993

1993年6月17日至20日在杭州大学召开第三届全国功能语法研

讨会。与会者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和浙江。来自海外的有 5 人，其中有 Christian Matthiessen，一名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两名是杭州大学和天津外语学院的外籍专家，还有一位曾立诚，原来是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硕士生，后来我推荐他跟 Matthiessen 在 Marquarie 大学念博士了。曾完全符合 Matthiessen 给我提的 3 个条件：英语专业，学过系统功能语法，会电脑编程。



在杭州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功能语言学研讨会的主会场

本次会议在几个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会议之所以在杭州大学召开，得益于系主任任绍曾教授和曾在该校任教的美籍专家 Peter Fries。Peter 的父亲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C.C. Fries，Peter 本人却参加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的活动，在主体分析上颇有建树。他在杭大工作期间，与任绍曾教授合作得很好，两人一起筹划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为主的全国性的语篇分析会议。可惜他没有等到会议召开就回国了。正是这个背景，日后任绍曾教授从系主任岗位上退下后，建议将全国语篇会议的活动交由功能语法学会管理。现在我也退下来了，相信同行们、朋友们不会辜负任绍曾教授的期望。

第二，本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如程琪龙、刘世生、杨信彰和原西南师范大学龙日金的学生彭宣维。事后证明，他们都是功能语言学界的佼佼者，如前三人都已是博士生导师，程是 Lamb 的层次语法和认知语法的嫡传弟子；杨是厦门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悉心研究功能语法的主位理论和投射理论，并应用于翻译；刘专攻功能文体学，曾任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彭后来考入我的门下，成了我在北大的关门弟子，后曾任功能语言学会的秘书长。其他如马博森、郎天万、曾连生、黄和斌都是本地区、本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会议总共提交论文 32 篇。从任绍曾教授和马博森合编的论文集《语言·系统·结构》（杭州大学出版社）可以看到，我国的功能主义学者已经进入了对语言系统的研究，如对汉语疑问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网络的研究；学者们试图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比较全面地而不是零星地解释某一语言现象或某一语言使用中的现象，如语类结构潜势和作格性；学者们扩大了功能语法理论的应用，其范围包括文学、文体学、广告语篇、日常会话、翻译和外语教学等。

#### 四、1995

第四届中国系统功能语法会议与第十二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合并在北京大学召开，时间为1995年7月18日至22日。由于我们缺乏举办国际会议的经验，对外联系不便，也害怕经费失控，我们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北大也可以发电子邮件了，对方与我联络的 Terence Lo 博士对大陆的进步感到吃惊，这一切使准备工作进行得更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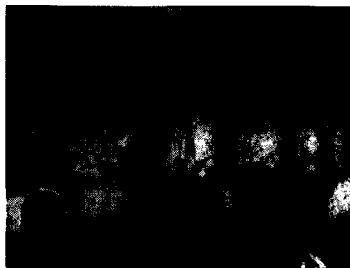
会前我们按前几届会议的惯例，在清华大学举行功能语法讲习班，主讲人有韩礼德夫妇、Margaret Berry 和 Eija Ventola 教授。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学者 William Greaves 教授也很热心，自费提前来京参与讲习班活动。我们把他安排在北大西门外的邮电疗养院。

显然，这次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我国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功能语言学已经走向世界。参加大会的国外学者达110人，国内学者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的50所高校，人数有116名，另有台湾学者和旁听者多人。与会的著名学者除韩礼德外，有 Ruqaiya Hasan, Robin Fawcett, Peter Fries, Michael Cummings, James Benson, William Greaves, Robert de Beaugrande 等。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会长 Francis Christie 在开幕式上至欢迎辞，后又主持了会员大会。为了安排代表们都有机会发言，分5个小组同时进行。

第二，鉴于韩礼德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师承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在闭幕式晚宴前，由北京大学梁柱副校长授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称号。这将晚宴引入高峰。韩礼德教授在答词中说，“It [The congress] is also an occasion for us to interact with our Chinese colleagues who share an interest in linguistics, both as a theoretical pursuit fundament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species, as individuals and as social beings, and in its application to practical problems of human existence — educational, clinical, information-technological and the like.” 这是对中国



第四届中国系统功能语法会议与第十二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合并在北京大学召开



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向韩礼德教授授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功能主义语言学家的最好评价和期望。

第三，经当时的国家教委高教司和季羨林先生领导的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的批准，高等院校功能语法研究会正式成立。国内代表利用一个晚上召开了全体大会，选举理事会。在这三喜临门的日子里，人们感到无比激动。这时，我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该松口气了。这也许是我第二年，即 1996 年，一心想退休的预兆。

第四，在会议期间，我和战友们树立了一些共识，如学会的活动是功能语言学的，而不仅仅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前几届的会标都为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这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功能语言学者（如在海外攻读 Lamb 的层次语法和 van Dijk 的语篇理论的学者），也利于扩展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思路。我们也欢迎汉语界的同行参加我们的活动。例如，在这次具有国际会议性质的第四届大会上，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用汉语宣读论文和讨论的小组，像马庆株、刘叔新先生等就是从本次会议后与我们保持联系的，并经常给我们的活动以指导。最后，外语界的老朋友，如陈治安、郭鸿、朱世昌、刘家荣、邹海琦、乐眉云等在百忙中纷纷与会；会议上涌现的新人为数更多，如熊学亮、李福印、高一虹、李战子、黄会健、彭望衡、向明友、王莉娅、田贵森、封宗信等。黄国文博士是陪着他的导师 Robin Fawcett 远道从英国赶来开会的。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进展》由我和方琰教授负责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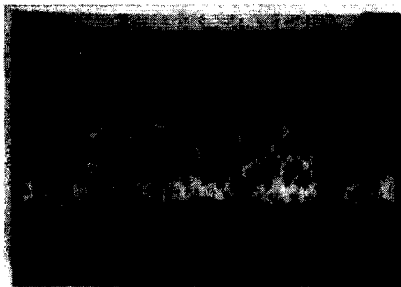
## 五、1997

在第四届会议的理事会上曾决定，为了壮大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队伍，年会争取在国内各个地区轮流召开。因此，第五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由重庆大学外语学院负责筹备。

会议于 1997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如期举行。重庆大学不负众望，接待的代表达 119 名，接受论文 109 篇，为历届会议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论文分布在 3 个小组宣读。由此可以看到，本次会议对推动西南地区的功能语言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这也可以从西南地区近年来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高等学校输送相当数量的语

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得到佐证。

大会的主题为“语言和功能，及其语用学原则和认知过程”。这表



第五届全国功能语言学年会全体代表合影

明了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的紧密关系，体现了功能语言学在我国发展的新趋势，即将对语言系统的选择过程和支配选择过程的语用学原则结合起来研究。与此同时，我们除了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语言，也要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考虑到认知科学今天的蓬勃发展，本次会议的组织者是有预见的。

我非常高兴，汉语界马庆株教授再次与会，而有关汉语研究的论文无论是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在数量上，与前几届相比均有进步。我个人认为，日后彭宣维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师从王宁，从系统功能语法研究汉语，与他前期所做的汉英对比研究活动和参与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有一定关系。会议的论文集《语言的功能——系统·语言和认知》，由余渭深、李红、彭宣维主编，姜治文主审，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次会议上涌现的新人有高仑、赵采香、熊沐清、张克定、冉永平、辛斌、司建国等。



我与重庆大学外语学院筹备会议的领导合影

## 六、1999

第六届全国会议由上海复旦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承办。其原因是高校林立的上海应该承担一次功能语言学的全国性会议；第二个原因是功能语言学会的副会长朱永生教授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解决经费问题和人员调动较为方便。第三个原因是原复旦大学系主任徐烈炯转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系主任。通过联合举办形式可以给母校复旦作些贡献。徐烈炯教授是搞转换成语法的，能慷慨相助，令人感动不已。我辈唯有搞好教学、加强科研，才是最好的回答。

会议是在8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有来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的近100名语言学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有Halliday、Hasan、Matthiessen、Ghadessy和Webster。会上宣读和交流论文60多篇。就会议宣读的论文看，对语法隐喻的研究受到重视，这可能与国际上Lakoff等人的关于隐喻和认知的研究相呼应；另一个核心议题是衔接与连贯的关系。论文集《世纪之交论功能》由朱永生教授和他的两位高足严世清和苗兴伟博士共同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严世清和苗兴伟现在分别是苏州大学和山东大学的骨干教师

和学术带头人。三位编者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学者应力争在理论建树上作出贡献，将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实际有待改进，功能理论与汉语研究应做到真正的结合，应进一步重视功能语言学在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在本次会议上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有严世清、苗兴伟、蒋勇、马铁川等。

## 七、2001

从上海移师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第七届年会意味着功能语言学研究向东北地区扩展。东北师范大学在“文革”前后早有一支较强的师资队伍，近年来又形成以副校长杨忠和外语学院院长张绍杰为核心的中青年学者队伍。他们召开过全国语用学年会，特别是在东北各高校中申报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成功，最能反映他们的实力。



第七届功能语言学年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有几件事印象颇深。会议于7月14日至16日在东北地区召开，为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三省的师生就近与会创造了条件，除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外，我知道的还有王莉娅、邹海琦、项蕴华、王洪刚、汤阳、张旭萍、王海燕等老师。

其次，广州中山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黄国文组成了7名中青年教员和研究生的庞大阵营前来与会，为会议增色不少。像戴凡、尚媛媛等的论文受到好评。

另一件趣事是关于下届会址的讨论。过去安排会议地点不那么妥当，因为主办单位要化时间筹备，要设法拉赞助，积极性不是最高。在这次理事会上，出现了新动向，许多学校争着要办。最后理事会只好学申办奥运那样，由有关学校做申办会议的陈述报告，向理事会汇报本校的总体情况、条件设备、交通条件、能接受与会人员的规模、经费的来源，等等。最后，理事会无记名投票，同意由秦皇岛的燕山大学主办。

理事会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凡两次没有参加会议的会员自动除名，但日后再来参加，学会仍热烈欢迎。

本次会议的论文集《语篇·功能·认知》，由杨忠和张绍杰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次会议的论文集《语篇·功能·认知》，由杨忠和张绍杰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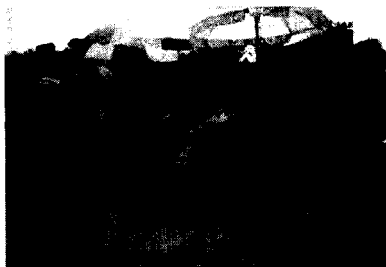
## 八、2003

2003年8月19日至22日在秦皇岛燕山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年会出现一个特殊情况，原来代表燕山大学外语学院申报主办这次会议的丁国声教授已经调离燕山大学，荣升秦皇岛外语学校校长，因而不具体主管整个会议。所幸接任的丁素萍教授在同事们的支持下，胜利完成了会议的各项任务，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达178人，远远打破了1995和1997年的水平。

第八届会议还创造了一个记录：除主办方的人数不计外，各校都组织了庞大的师生代表团，如以田贵森教授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12人，以张德禄教授为首的中国海洋大学11人，以黄国文教授为首的中山大学10人，以杨信彰教授为首的厦门大学8人，以邹海琦教授为首的东北林业大学7人，以郭鸿和李战子教授为首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6人，以李发根教授为首的江西师范大学6人。其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来了5人，苏州大学和河南大学4人，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各3人。这一下，把中山大学黄国文院长在长春会议上创造的7人记录刷新了。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理事会同意由黄国文教授接替我的会长工作。我想，这对我国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有帮助。黄是双料博士，与国外联系多。近年来多次邀请了韩礼德夫妇和 Martin、Fawcett、Peter Fries、Paul Thibault、Ghadessy 等国外学者来华讲学。近年来，把 [www.LanguageRA.org](http://www.LanguageRA.org) 网站建立起来，使国内功能语言学研究有个沟通信息、交流学术的园地，如 James Martin 在中山大学的讲稿全部在网站发表，我本人和研究生们都受益不浅。

1989~2003，在这峥嵘岁月中，我经历了和见证了所有这八届年会。我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黄国文会长和学会的其他领导，一定会不负众望，把学会的工作做得更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部分代表在秦皇岛海滩合影

# 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展望

■ 复旦大学 朱永生

## 一、引言

迄今为止，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经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虽然该流派的成员之间在如何看待语言的功能及其这些功能如何在语言各层次中得到体现等一系列问题上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把语言的功能视为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取得的成果也是令人瞩目的。在这里，我们打算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今后可能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理论上可能发生哪些新的突破以及实际应用上可能取得哪些新的进展等方面进行展望。

## 二、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完善

Halliday在1999年中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发言中讲到功能语言学发展的特点时曾经指出，功能语言学是演变性的(evolutionary)，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功能语言学理论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正如Halliday(1983)在“系统语言学的背景”(Systemic Background)一文中坦陈的那样，他所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能有今天，不是靠几个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割断历史，从零开始，闭门造车，孤军奋战得来的，而是从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及王力和罗常培等中国语言学家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吸取了许多正确的观点，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探索而产生的结果。第二，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阶与范畴语法”到后来的系统功能语法，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根据这种理解，我们可以断定，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派不会于某一天突然宣布以前的所有观点都是错误的，一切都从现在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断言，功能语言学的整体理论框架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将要发生的是对已经发现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

功能语言学理论将可能在哪些方面作出新的探索呢？在我们看来，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如何反思自己的语言哲学观。语言是

社会现象，还是心理现象？语言活动是社会行为还是心理行为，还是两种属性都有？第二，如何验证有关语言的各种假说，如三大功能的假说。是否如Halliday所说的那样，语言假说总体上不可验证，但局部可以修正？第三，如何进一步说明语境与语篇语义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语境因素与语义结构之间是否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第四，衔接与连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先有连贯，还是先有衔接？两者之间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如何对那些缺乏衔接手段但语义连贯的现象作出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第四，如何通过与人工智能的开发检验并修正现有的理论框架，更加客观地对语篇语义结构进行描写。

与此相关的是方法论的改进。不能指望所有功能语言学家抛弃自己现有的研究方法而全盘接受其他学派的研究方法，但可以预见，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语言学家要吸收其他学派理论中有益的部分，以修正与完善自己的理论，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研究目标。

具体地说，功能语言学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向其他语言理论学习。第一，在注重语言变体研究的同时，从生成语法学那里学习如何加强对语法规则（主要是句法规则）的研究。第二，在语言运作尤其是衔接与连贯相互关系的研究上，从语用学那里借鉴语用预设、逻辑推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关联理论；从认知语言学那里借鉴心理空间、语义映射、概念整合等理论。第三，在儿童语言习得与成人语言发育方面，从考古学、解剖学、脑科学、基因学和神经语言学那里讨教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分布相关的问题。第四，在语篇生成方面，从计算语言学那里吸取如何借助计算机技术检验语言学理论模型是否正确与完善的经验。

下面，我们就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功能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的结合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 （一）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

以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过去一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与功能，长期以来，没有对认知语言学予以直接的关注而且多次对Chomsky为首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提出批评。然而，近几年来，Halliday及其合作者不止一次地谈到认知语言学的若干概念，并承认认知语言学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Halliday和Matthiessen (1999)就如何看待经验和知识的关系以及语言与经验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先讲经验与知识的关系。什么叫经验 (experience)? 在认知学家看来，经验是一种知识 (knowledge)，其表现形式是概念分类 (conceptual

taxonomies)、心理图式 (schemata) 或脚本 (script)。经验的建构通常被看作是知识的建构。但 Halliday 和 Matthiessen (1999: 1) 明确指出“经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生经历”，而是“一种意义的源泉，一种能用来理解、反映或影响现实世界的潜势”。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定义并不意味着经验与知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实际上二者是对同一现象的两种隐喻。这就是说，认知语言学家和功能语言学家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客观现象的。前者把经验看作是人类个体对客观事物的心理感受与记忆，而后者则把经验看作是意义的建立与交换。

再讲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家倾向于把经验看作是知识，而知识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但可以通过语言编码得到反映。在 Halliday 和 Matthiessen (1999: 3) 看来，这种想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他们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存在于符号系统之中，而语言正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子系统，所有经验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无法离开语言。

此外，认知学家认为经验之间有自身的出现次序。功能语言学家则认为，经验之间的次序是由语言赋予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语言的角度来界定经验，把经验看作是人类借助语言得到理解的现实世界。换言之，语言不仅可以用来交换经验、储存经验，而且还可以用来建构经验、理解经验。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只是所有问题中的一部分。随着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的突飞猛进，语言学本身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承担比以往更加艰巨的研究课题，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做出更多的贡献。与此同时，功能语言学内部任何一个分支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相互借鉴，才能在现有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 (二 功能语言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Halliday 等就尝试把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机器翻译中去。60 年代他有机会与层次语法的创始人、美国语言学家 S. Lamb 共事，共同探讨将各自的语言理论应用于计算语言学的可能性。80 年代，他到美国加州大学信息科学学院，与 Mann 合作研究名为 PENMAN 的项目，探讨语篇的生成。Halliday 在这个项目中担任顾问，起主要作用的是功能语言学的后起之秀 Matthiessen。到 90 年代，Halliday 又与日本的菅野教授深入讨论人工智能尤其是模糊系统研究方面问题。直至今日以 Halliday 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家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否将语言理论直接应用于人

工智能的开发，是检验语言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完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使语言理论发挥更大作用的极好机会。

根据我们的理解，要计算机生成语言，必须经历四个步骤。一、有一套合适的理论。在这个层面上，需要明确采取什么视角，即如何看待语言现象，想解决具体哪些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采用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二、语言表达。在这个层面上，需要从理论上掌握语言使用的规律及其表达手段。如果我们使用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最重要的表达手段就是这个理论提出的系统网络。然后是我们所要描写的具体语言中的具体而真实的表达方式。三、计算机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要做的是把上述第二点所讲的语言表达通过计算机重新加以表达。四、实际操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关心的是如何尽最大可能确保计算机表达的是完美的。在这四个步骤中，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语言学家自己能做到的，而第三步和第四步则需要计算机专家和计算语言学家的合作。实践证明，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可以应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而且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关于意义的理论。

Halliday等认为，人工智能的开发，离不开语言意义的计算，而这种计算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Halliday指出，要建立完整的语言复杂性管理系统，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 (1) 词通过进入句子（即词汇语法模式）而发挥作用。
- (2) 词句子的意义构成语言模式或各种意义。
- (3) 意义与语境特征取得系统性的关联。
- (4) 特定的词句子或意义实例根据它们在系统（系统网络内部的关系或同属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获得量值。
- (5) 系统包含子系统变体（即语域变体）。
- (6) 意义以元功能的形式组织而成（分为各个语义空间区域，这些区域决定语法的形式及其与语境之间的关系）。
- (7) 意义的历史涉及三个方面：系统的进化，单个语篇的展开，以及婴儿到成人的发育（即系统生成、语篇生成和个体生成）。

到目前为止，Halliday等功能语言学家已经对语义的内部结构即子系统网络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但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意义模型。完成这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是功能语言学家今后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

## 四、功能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应用

长期以来, Halliday 一直主张, 语言学应注重实用, 而不应只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上, 并把这一点看作是功能语言学的特点之一。以他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家身体力行, 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话语分析、双语翻译、人工智能和文体研究等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 我们对功能语言学在这些领域中的应用前景进行讨论。

### (一) 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语言教学离不开语言技能的培养, 而语言技能的培养与语言功能的了解和掌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国内外都有人尝试把语言功能概念引入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中去。最先尝试的领域是会话编写与口语教学。不久, 人们便认识到不能局限于这个领域。事实上, 教学大纲的制订、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练习的设计、教学方法的选择、测试体系的建立, 都需要考虑如何真正帮助学生提高实际使用外语的能力, 使外语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在课堂上, 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例如, 课文的理解与衔接理论相关, 歧义的消除与语境理论相关, 上下文的连贯与语篇特征理论相关, 翻译过程中意义的取舍与语言的纯理功能假说相关, 教师经常使用的释义 (paraphrasing) 方法与语言层次 (stratification) 理论相关, 偏离常规的表达方式与语法隐喻理论相关, 篇章语义结构的分析与语类结构潜能 (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 理论相关。对于任何一个外语教师来说, 懂一点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是有好处的, 懂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功能语言学理论在外语教学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但真正懂得功能语言学的教师还不多。此外, 据我们所知, 国内外至今还没有自始至终以功能语言学为指导的成套外语教材。如何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还需要功能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大力配合, 共同努力。

### (二) 功能语言学与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是过去三十年以来兴起的语言学分支。它的分析对象包括了几乎所有种类的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然而, 话语分析并没有独自完整的理论体系。严格地讲, 它是对多种语言理论的实际应用, 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范畴。在它应用的语言学理论中, 功能语言学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市场上的买卖交易, 家庭成员之间的

日常交谈，还是课堂上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法庭上控辩双方的唇枪舌战，无论是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电视上的商业广告，还是学术讲坛上的科学报告，各国总统的竞选演说，都可以应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对它们进行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话语分析没有自身的指导理论和分析方法，采取的是“拿来主义”，而且范围宽泛，缺乏重点，也没有预定目标。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势必影响话语分析的深度。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功能语言学家和话语分析家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规划，明确今后打算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在哪些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

对于我国学者来说，在今后的十年中在汉语分析方面应该做出自己的成绩。这种分析应该是有理论指导的，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理论。这种分析应该是符合汉语事实的，是中国人使用的真正的活的语言。这种分析应该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问题既包括汉语这个符号系统的本体，如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篇结构，也包括超越这个本体之外的又与汉语系统相关的领域，如汉语语言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汉语语言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关系等。可以单独就汉语进行研究，也可以通过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总之，我们需要在母语研究方面走出比较象样的步伐。

### (三) 功能语言学与辞书编撰

在有些人看来，辞书编撰最重要的是对词汇的掌握，不需要多少系统的语言学理论。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就词的意义而言，词本身是没有确定的概念意义的，只有把它放到上下文或外部语境之中才能确定。最明显的是一词多义的现象。以 bank 为例，它在 She swam back to the bank 中表示“河岸”，在 She works at City Bank 中则表示“银行”。英国语言学家 J. Sinclair 主编的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一改以前的释义方式，以完整的句子而不是同义词来对词的意义进行解释，借助语境帮助读者理解词的含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除了概念意义之外，词还有搭配意义。例如，strong 与 country 结合时，表示“强大”，与 tea 结合时，其意义则为“浓”。又如 rancid 和 addled 虽然都表示“不新鲜”，但 rancid 只能和 bread 搭配，addled 只能和 egg 搭配。编撰任何一部搭配词典，都离不开对这种意义的充分考虑与合理安排。

此外，词还有文体意义。如 die 是实话实说的中性词，pass away

口气婉转 而kick the bucket则显得随便，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的味道。在词典编撰过程中，除了日常使用的普通词外，还经常收录不同领域的专业词汇和术语。这些词汇和术语的出现受到话题的制约，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以与具有相似概念意义的普通词替换用的。如“支点”是物理学的术语，通常在与物理学相关的文体中出现，而不会用于日常生活对话。有些词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使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如 cleanse这个词虽然在概念意义上与 clean 相同，但一般只用于商业广告之中，而 clean则适用于各种文体。如果辞书编撰者缺乏语域理论，就很难真正认识到给相关词汇标明文体特征的重要性。

# “话语转向”时代的语篇分析

■ 山东大学 苗兴伟

## 一、引言

近年来,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在语言学乃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概括语篇分析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或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或 cross-disciplinary 性质,有些学者倾向于使用“语篇研究”(discourse studies 或 discourse research)这一术语(Renkema 1993, van Dijk 1997c, Jaworski & Coupland 1999)。Wood & Kroger (2000: 18)强调,语篇分析既是多学科的也是跨学科的。Van Dijk (1997c: xi)指出,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语篇研究包含了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有关语篇与谈话的理论和分析。目前,语篇已经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语篇分析则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Parker (1999), Sarangi & Coulthard (2000), Harré (2001) 和 Weatherall (2002)将这种现象称作“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 或 turn to discourse)。本文拟对“话语转向”时代的语篇研究作简要的评述。

## 二、术语问题

关于“语篇”、“话语”和“篇章”,有学者作不同的定义,也有学者对这些术语进行了区分(参见胡壮麟 1994)。本文对“语篇”和“话语”等概念不做严格的区分。在英语中,“text”和“discourse”这两个术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Wood & Kroger (2000: 19)认为在术语的使用上存在着三种倾向:(1) text和discourse可以替换使用,不做区分,(2) 用 discourse 指口语语篇,用 text 指书面语篇,(3) 根据 Saussure 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划分将 text与“语言”相对应,将 discourse与“言语”相对应。

Stillar (1998: 11-12) 认为 text 通常指涉及语言系统的话语过程的记录,在形式上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语的。也就是说, text 是音位的和/或字体的、词汇的和句法的以及语义的语言资源的体现。Discourse 通常指我们运用语言的及其他的语义资源来表达意义的社会活动。类似的区分见于 Hodge & Kress (1988), Fairclough (1989, 1992a),